

解构与重构：后现代语境下电影音乐中的暴力美学表达

——以电影《杀死比尔》与《功夫》为例

杜鑫源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1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2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13日

摘要

文章聚焦后现代语境下电影音乐中的暴力美学表达，以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系列与周星驰的《功夫》为核心案例，结合暴力美学、拼贴艺术等核心理论，分析后现代电影音乐的美学逻辑与表达策略。研究表明，两部作品均打破传统音乐叙事规则，以跨类型、跨文化、跨时代的拼贴手法重构音乐与影像的关系，通过节奏同步、风格反差和文化拼贴以及幽默化处理等方式，在暴力场景与情感表达中形成独特审美张力。这种创作既彰显了后现代艺术解构经典和打破边界的本质，又完成了对电影音乐美学功能的拓展，使音乐从影像陪衬升级为承载叙事、情感与文化内涵的核心元素，为后现代电影音乐的创作与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视角。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暴力美学，拼贴艺术，《杀死比尔》，《功夫》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Expression of Violence Aesthetics in Film Music with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Kill Bill* and *Kung Fu Hustle*

Xinyuan Du

College of Music,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April 11, 2026; accepted: May 2, 2026; published: May 13,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xpression of violence aesthetics in film music with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Taking Quentin Tarantino's *Kill Bill* series and Stephen Chow's *Kung Fu Hustle* as core case studies, and integrating core theories such as violence aesthetics and the art of pastiche, it analyzes the aesthetic logic and expressive strategies of postmodern film music.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both films break traditional rules of musical narrative,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and image through a pastiche technique that crosses genres, cultures, and eras. By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rhythmic synchronization, stylistic contrast, cultural pastiche, and humorous treatment, they create a unique aesthetic tension between violent scene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This creative approach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postmodern artistic essence of deconstructing classics and breaking boundaries but also expands the aesthetic function of film music, elevating it from a mere accompaniment to images into a core element that carries narrative, emotion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is provid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the creation and cultural value of postmodern film music.

Keywords

Postmodernism, Violence Aesthetics, Art of Pastiche, *Kill Bill*, *Kung Fu Hustl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后现代语境下电影音乐美学的核心概念

后现代电影音乐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电影音乐领域的具体投射，其核心特征体现为解构与重构的双重逻辑，秉持多元拼贴的创作理念，赋予观众更广阔的解读空间。

1.1. 暴力美学与电影音乐的互动关系

后现代主义的“拼贴”与“解构”为暴力美学提供了风格，而暴力美学则是呈现这些后现代内容的一种形式。“暴力美学”产生于后现代，以枪战、打斗等视觉场面为重点表现，是一种将暴力元素审美化处理的艺术形式和风格[1]。

暴力美学作为后现代电影的核心审美范畴，其核心在于将暴力场景通过艺术化处理转化为具有审美价值的一种视觉体验，而电影音乐是这一转化过程的关键媒介。一方面，音乐通过节奏与暴力动作的同步，强化暴力场景的视觉冲击力，如快节奏鼓点与打斗动作的同步呼应；另一方面，音乐通过风格反差消解暴力的残酷性，如以抒情音乐、古典音乐搭配血腥场景，形成强烈的审美张力。这种“暴力 + 音乐”的组合，使暴力摆脱单纯的感官刺激，成为承载人物情感、推进叙事与文化内涵的艺术符号[2]。

1.2. 拼贴艺术在电影音乐中的体现

拼贴艺术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创作手法，其本质是将不同来源和不同属性的元素并置组合赋予新的意义。在电影音乐中，拼贴艺术具体表现为三重维度：风格拼贴，即融合摇滚、古典、民谣、电子、传统民乐等不同风格音乐；文化拼贴，即跨越东西方音乐边界，将东方的古筝、二胡、尺八与西方的交响乐、

爵士乐、乡村音乐等元素交织；时代拼贴，即引用不同年代的经典音乐作品，通过剪辑、重组使其适配于当代叙事[3]。拼贴手法不仅丰富了电影音乐的听觉层次，更通过不同元素的碰撞产生了新的叙事意义，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

2. 《杀死比尔》：暴力叙事中的音乐拼贴与美学张力

2.1. 影片背景与音乐创作理念

《杀死比尔》系列是昆汀·塔伦蒂诺极具代表性的电影作品，以复仇为核心叙事线索，通过大量暴力场景与非线性的章节化叙事，构建了一个风格鲜明、充满戏剧张力的电影世界。昆汀·塔伦蒂诺的音乐创作理念与其整体风格高度统一：他拒绝采用传统的“量身定制”式的电影配乐，而是在剧本构思阶段便融入大量现成音乐(即“套用音乐”)[4]，使音乐成为与影像平行甚至是先行的叙事元素。影片广泛引用东方武侠电影配乐、意大利西部片音乐等，形成一种多元混杂、跨越文化与时代的听觉拼贴，为暴力叙事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维度。

2.2. 暴力场景中音乐的美学特征

节奏同步强化暴力的舞蹈化韵律：《杀死比尔》中的暴力场景以高速剪辑和富有节奏感的动作为特征。音乐通过节奏与画面动作的精准同步，将血腥打斗转化为具有韵律感的审美体验。例如，石井御莲带领手下进入“青叶屋”的场景，配乐采用了日本音乐人布袋寅泰创作的 *Battle without Honour Humanity* [5]。该曲具有强烈的金属风格，其节奏重音与角色步伐、刀剑出鞘、镜头切换的频率高度同步，使暴力场面呈现出如舞蹈般的仪式感与韵律美，让观众从纯粹的视觉刺激转向对形式美的欣赏，体现了暴力美学中“艺术化处理暴力”的核心特点。

风格反差营造暴力的悲剧性张力：这部影片通过音乐与画面的情绪反差来营造独特的审美空间。例如，石井御莲被“新娘”砍头的场景，配乐选用的是日语歌曲 *The Flower of Carnage*，其旋律凄美哀婉，充满命运悲剧感，与血腥的画面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反差淡化了暴力的直接冲击，引导观众关注角色悲剧性，增强场景感染力，打破了“暴力必须配激烈音乐”的惯例。

2.3. 拼贴艺术在音乐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杀死比尔》的音乐拼贴具有鲜明的跨文化特征。昆汀将东方传统音乐元素与西方现代音乐风格并置。例如，“新娘”在寻找服部半藏铸刀的段落，配乐以排箫音色为主，旋律悠远宁静，营造出东方禅意与孤独感。影片多次引用电影《天下第一拳》的配乐 *Ironside*，该曲在主角与仇敌对视时重复出现，通过熟悉的听觉符号强化复仇情绪的连贯性[5]。这些音乐拼贴不仅丰富了听觉层次，也构建了一个融合东、西方文化符号的叙事空间。

3. 《功夫》：荒诞叙事中的音乐拼贴与美学创新

3.1. 影片背景与音乐创作理念

《功夫》是周星驰的转型之作，以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上海为背景，通过荒诞叙事讲述阿星觉醒成为武林高手的故事，融合喜剧、动作和武侠等多种元素。影片音乐创作由周星驰与配乐师黄英华合作完成，秉持后现代拼贴理念，将中国传统音乐、西方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等元素融为一体。与《杀死比尔》相比，《功夫》的音乐更注重与喜剧元素的结合，通过音乐与影像的反差制造出幽默效果，同时融入中国武侠文化音乐元素，体现了东方语境下后现代美学的独特表达。

3.2. 暴力与喜剧交织中的音乐美学表达

3.2.1. 幽默化暴力：音乐与喜剧元素的融合

《功夫》的暴力场景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音乐通过与喜剧元素的深度融合，将暴力形式幽默化、艺术化表达。例如配乐《流浪者之歌》快板部分用在包租婆与阿星的一段追赶场面，动漫感和夸张的肢体跑动，这样的动作配以快速的小提琴音乐使得这段影片显得十分幽默生动；此外，电影开始是一段带有爵士风格的《我不入地狱》，斧头帮老大跳舞和斧头帮的恶行两组场面交叉同时进行，并且跳舞的人员越来越多也暗示了斧头帮势力逐步壮大。这段诙谐的舞蹈配上律动感十足的音乐，充分显示出了斧头帮的猖狂[6]。旋律悠扬、节奏轻快，与血腥的场景形成强烈反差，产生荒诞的幽默效果。这种表达既消解了暴力的残酷性，又契合影片“以喜写悲、以荒诞写现实”的独特风格，使暴力场景成为承载喜剧效果与社会讽刺的载体。

3.2.2. 武侠音乐的现代化改编与暴力美学表达

作为武侠题材影片，《功夫》中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武侠音乐元素，并进行现代化改编，与暴力场景结合形成独特的东方暴力美学。例如，在影片中，斧头帮准备围攻猪笼城寨，在斧头帮与三位高手打斗时响起了《将军令》这首乐曲片段。这首音乐作品经黄英华重新编配之后用在该影片中。在混乱的打斗场面下巧妙地将扬琴连接其中，再加上锣鼓喧天，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了电影打斗场景的热闹和激烈以及三位隐世高手的侠义和高强的功夫，强化了暴力场景的视觉冲击力与艺术张力；在盲人杀手与三大高手决斗时，配乐选用《箏锋》，这首音乐改编自琵琶曲《霸王卸甲》，以古筝为主要演奏乐器，结合电影中的武侠元素，塑造出兼具传统与现代感的音乐风格。黄英华在《箏锋》中延续了其擅长的民乐与大场面结合的创作手法，通过古筝的凌厉节奏与西洋乐器的厚重质感，形成强烈的听觉对比，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氛围。这种中西混合的配乐方式，为电影场景增添了独特的东方韵味，使其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实现了东方暴力美学与后现代理念的融合。

3.3. 拼贴艺术在音乐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3.3.1. 风格拼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

《功夫》的音乐创作充分体现了多元风格的拼贴与融合，将中国传统民乐、西方古典音乐、现代流行元素乃至爵士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跨越文化与时代的听觉体验。例如，斧头帮老大跳舞的片段配以带有爵士风格的《我不入地狱》，通过诙谐的律动与画面中斧头帮恶行的平行蒙太奇形成强烈反差，凸显其荒诞与讽刺意味；阿星与包租婆的追逐戏则选用了西班牙小提琴名曲《流浪者之歌》的快板段落，西方古典音乐的激情节奏与中国功夫喜剧的夸张动作相结合，营造出既紧张又幽默的独特效果。此外，如在阿星前往精神病院解救火云邪神时运用《马刀舞曲》，此配乐以俏皮轻快的西方管弦乐反衬情节的荒诞与角色伪装出的平静，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后现代拼贴美学。这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音乐混搭，不仅丰富了电影的听觉层次，也反映出了后现代文化中多元共存以及界限消融的特质[1]。

3.3.2. 文化拼贴：武侠文化与流行文化的互文与重构

影片的音乐创作深度融合了中国武侠文化与传统民间音乐，并通过与当代流行文化语境的拼贴，完成对经典的重构与戏仿。例如，《十面埋伏》这首作品是描绘楚汉战争宏大场面的大型琵琶曲，被用于阿星与肥仔冒充黑社会闯入猪笼城寨的场景，音乐本身的紧张感与角色行为的滑稽形成强烈反差，赋予这场市井戏一种荒诞感[6]；音乐《闯将令》原为表现英雄气概的民族管弦乐，却在火云邪神——一位身穿背心、脚踩人字拖的“终极反派”出场时奏响，崇高与世俗并置，既解构了传统武侠片中“英雄专属

BGM”的惯例，也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此外，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东海渔歌》《小刀会序曲》和《四川将军令》等经典民乐，均不同于传统历史题材；黄英华通过重新编配，将其嵌入现代叙事的打斗与情节转折中，使音乐不仅是气氛的烘托，更成为连接历史武侠记忆与当代观众情感的文化桥梁。这种文化层面的拼贴，既致敬了武侠电影的黄金时代，也通过戏仿、降格和讽刺等手法，构建出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后现代江湖”。

4. 《杀死比尔》与《功夫》音乐美学的比较研究

首先是相同点，两部作品均将拼贴艺术作为音乐创作的核心手法，打破传统电影音乐的叙事逻辑与风格边界。在跨文化融合方面，电影《杀死比尔》融合了日本传统音乐、美国乡村音乐与中国武侠配乐，而《功夫》则以中国民乐为核心融入西方古典音乐；通过元素之间的碰撞产生新的意义，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解构经典、打破边界的内核[4]。《杀死比尔》通过节奏同步强化暴力的韵律感，以风格反差赋予暴力悲剧性；《功夫》则通过喜剧化的音乐处理，将暴力转化为荒诞场景。两部电影中的音乐均成为与影像同等重要的叙事元素。这种“音乐叙事”的表达手法，打破了“影像为主、音乐为辅”的传统模式，彰显了后现代电影音乐的独立性与核心价值。

不同之处在于，《杀死比尔》的暴力美学呈现“严肃化”与“悲剧性”特征，音乐通过抒情元素与暴力场景的碰撞，赋予暴力复仇的沉重感与命运的无常感，而《功夫》中的暴力美学则呈现“幽默化”与“荒诞化”特征，音乐通过喜剧元素的融入，将暴力转化为消解现实压力的幽默场景。这种差异源于东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西方文化中暴力常与复仇、悲剧相关联，东方文化则倾向于以幽默、戏仿消解暴力的严肃性[2]。

5. 电影音乐在暴力美学表达中的叙事功能与审美价值

5.1. 叙事功能：超越常规配乐的暴力修辞

在暴力美学框架下，电影音乐展现出了独特的叙事功能：首先节奏塑形，通过节奏与暴力动作的同步，将混乱打斗转化为具有韵律感的“视听舞蹈”，如《杀死比尔》中鼓点与刀剑的呼应，《功夫》中民乐节奏对武打招式的强化。其次情感调节，利用音乐风格与画面情绪的故意错位，缓解观众对暴力的心理距离。抒情音乐搭配血腥场景如《杀死比尔》斩首片段可引发悲剧共情；诙谐音乐配合暴力动作如《功夫》追逐戏则转向喜剧之情。再者文化注入，跨文化拼贴为暴力场景注入历史与地域维度，使暴力不仅是物理冲突，更是文化符号的碰撞。如《杀死比尔》中东方乐器暗示角色身份，《功夫》中民乐唤起武侠集体记忆。最后塑造人物形象：通过音乐风格的选择传递人物性格与内心世界，如《杀死比尔》中“新娘”的复仇之路搭配多元风格音乐，体现其坚韧与复杂，《功夫》中阿星的成长历程通过音乐风格的转变，暗示其从混混到英雄的蜕变。

5.2. 审美价值：传统审美边界的突破与后现代美学的建构

电影音乐在暴力美学表达中的审美价值，核心在于突破传统审美边界，构建后现代电影美学的新形态。首先是形式创新，拼贴手法打破了传统电影音乐的风格统一性，通过多元听觉元素的并置、碰撞，创造出适合暴力表达的断裂感、异质性与多义性，拓展了电影音乐的形式边界。其次音乐使暴力场景承载超越叙事本身的情感与文化内涵。暴力不再是终点，而是通过音乐成为探讨权力、身份、复仇、救赎等主题的媒介。通过艺术化形式使观众思考暴力的复杂本质，这种跨文化、跨时代的音乐拼贴，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审美对话。这种审美价值的实现，不仅丰富了电影音乐的创作路径，也为后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6. 总结

后现代语境下的电影音乐，以拼贴为核心创作手法，以暴力美学为重要表达路径，以叙事功能为核心目标，呈现出多元包容、边界消融的鲜明特征。《杀死比尔》与《功夫》作为东西方后现代电影的代表作，其音乐创作既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打破传统、重构意义的美学精神，又因文化语境呈现出独特的地域化特征。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分析可见，后现代电影音乐不仅实现了自身美学边界的拓展，更推动了电影艺术整体的创新发展。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后现代电影音乐将继续突破传统束缚，探索更多元、更具创新性的表达形式，为电影音乐的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参考文献

- [1] 郝建. “暴力美学”的形式感营造及其心理机制和社会认识[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05(4): 106.
- [2] 张蜀津. 当代电影创作中的“暴力美学” [J]. 艺术评论, 2004(3): 28-35.
- [3] 朱笑辰. 音乐拼贴艺术在后现代电影中的美学价值及应用策略[J]. 电影文学, 2025(1): 108-112.
- [4] 魏巍. 试论套用音乐对电影文学的启发性——以电影《杀死比尔 1》为例[J]. 艺海, 2019(4): 28-33.
- [5] 黄望莉, 汪乐萱. 从《杀死比尔》看暴力美学与音乐元素的结合[J]. 电影新作, 2018(3): 106-109.
- [6] 毕亚楠. 电影《功夫》中的传统音乐赏析[J]. 电影文学, 2014(4): 133-134.